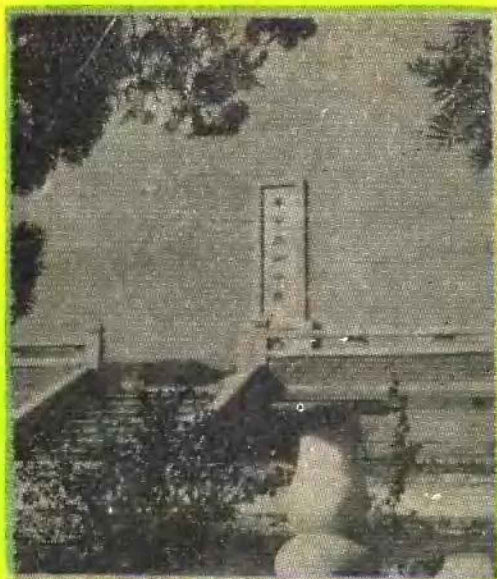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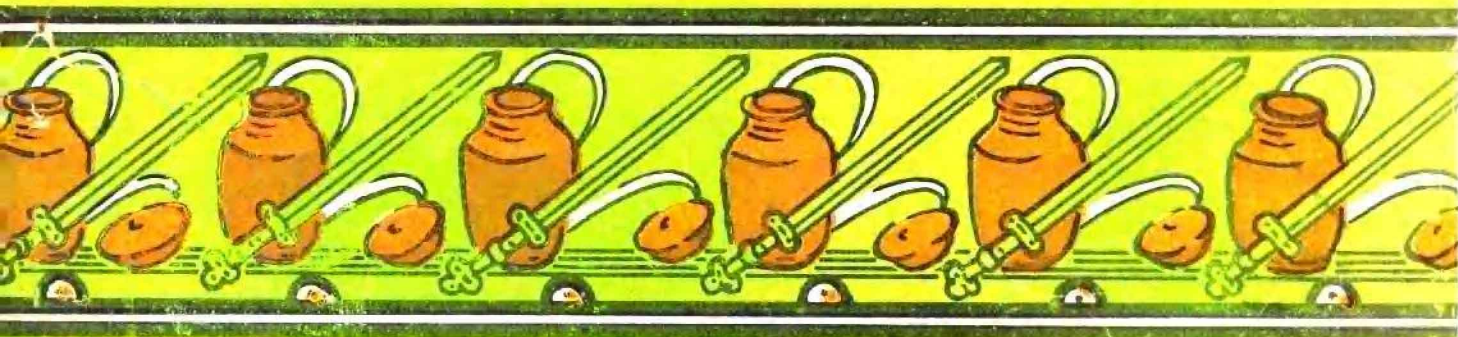


13.08



武平文史資料

第一輯
（1983年）



武平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44138/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武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三年一月

武平文史资料

第一辑

目 录

前 言	(1)
武平县概况	(2)
插图：武平概要图	张维渊摄
武城新貌	张维渊摄
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三次入武平	县革命史迹陈列馆供稿 陈旭祥整理 (5)
插图：梁山书院	张维渊摄
武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简介	县革命史迹陈列馆供稿 邱志良整理 (7)
插图：县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	陈旭祥摄
十载风云子夜中	陈仲平 (8)
粉碎涂思宗的“六路围剿”	谢毕真 (33)
辛亥革命浪潮中的武平	钟佩英整理 (36)
肖其章先生传略	县委统战部供稿 蓝道川整理 (38)
插图：肖其章烈士墓志	陈旭祥摄
从社墩上发现古剑谈起	蓝耀文 (39)
插图：铸铜古剑、陶尊、石箭礮、石纺轮	陈旭祥摄
今昔咏狮岩	何安庆整理 (41)
插图：狮岩景色	张维渊摄
梁野山古母顶	何安庆摄
梁野山顶古母石	张维渊摄
忆录《闽粤赣边纵队之歌》	练招武 (43)
征稿启事	(40)
刊名题字	郑霖
封面设计	蓝耀文
封面插图：武平革命烈士公墓	张维渊摄

前 言

武平位于闽西南，地处闽、粤、赣三省边陲的山区县。自宋初由武平场升置县治以来，直至如今已近千年。在解放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由于社会制度等原因，形成长期兵匪交虐，苦难深重的地区。

但是，武平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是勤劳勇敢的英雄的人民，在近千年的艰苦历程中，茹苦含辛，流汗流血，每一次社会革新和革命运动中，都涌现了不少慷慨悲歌之士。特别近几十年来，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气壮山河，确是可歌可泣。所以，武平近百年的历史，可说是丰富多彩。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述，现在来从事蒐集整理，已是头绪纷繁，困难不小。为此，在一九八一年春县政协成立之后，即于同年八月设立文史资料工作组，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文史工作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求实，要使资料成为研究历史的素材”；和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关于“本届政协，应把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切实抓好”等指示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采用“集管窥以观全豹，汇细流而成大川”的方法，经过一年多来征集、研究、整理，在领导的重视支持和有关部门大力协助下，现在《武平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了。这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

但是，由于人新、事生，水平有限；加上我们对分处在县内外革命老前辈和各界人士的广征博采工作做得很不够；同时，时间匆促，急于求成，因此，我们的编辑工作，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这一辑的出版，使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有了个良好的新开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今后的任务，将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而更加艰巨繁重。这除有待于我们本身的极大努力外，更主要的是要有各方面的更加广泛的襄助。我们谨在此衷心恳请熟悉我县文史掌故的前辈和各界人士，就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撰稿源源赐寄，以充实篇幅，并对我们的工作随时给予指导，使我县文史资料日就月将，以副县委和全县广大人民的厚望。

一九八三年一月

磷矿、钴矿、铀矿、钨矿、锡矿、无烟煤、大理石、膨润土、甲长石、白云石等。

全县大小河流有二百多条。溪流多蜿蜒于群山峡谷之中，流速快，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主要河流也有三条：一是中山溪。发源于东留、万安、城关公社境内，流经平川镇、城关公社和中山、下坝等公社，入广东蕉岭。二是桃澜溪。发源于大禾、永平公社境内，流经桃溪、湘店公社，注入汀江。三是中赤溪。发源于十方、岩前公社，与下坝公社小溪流汇合，流入蕉岭。

全县的地质结构，原生岩分布很广，尤以花岗岩为最；其次是变质岩中的片麻岩、干梅岩等；在东南部分布着较多的沉积岩，如石灰岩等。土壤生成受气温较高，雨水充沛等气候影响，风化强烈，所以红壤为武平分布最广的土壤，且多呈酸性反应。另外，由于县境植物茂盛，故山地之灰棕壤分布亦广。

本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主要气候特点有四：一、四季分明，夏长冬短。按气候学四季划分标准，我县城关地区春季开始于二月九日，历时八十三天；夏季开始于五月三日，历时一百六十一天；秋季开始于十月十一日，历时七十五天；冬季开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历时四十六天。具有夏长冬短，春秋相当的季节特点。但由于地形状况，海拔高度的不同，所以各地之四季长短亦有差异。二、气候暖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无霜期长。年平均温度在 17°C — 20°C 之间，无霜期二百七十五天左右。气候温值在 7.9°C — 27.7°C 之间，既少出现候温低于 0°C 的严寒期，也少出现候温高于 30°C 的酷暑期。年降雨量在1600—1800毫米之间。三、雨量集中，干湿季节分明。降雨量主要集中在四至六月，其次是七至九月。在这期间，多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尤其是四至六月，阴雨连绵，称为雨季，而秋、冬两季天气晴朗，干燥少雨。四、灾害性天气种类繁多，活动较为频繁。如春寒、倒春寒、五月寒、寒露风、霜冻，还有干旱、冰雹、雷暴及短时的大风等，每年都可能在局部地区出现一、二种。特别是春季的长期低温阴雨和秋季冷空气的过早南下，给农业生产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武平人民富有斗争的精神，武平山水映着革命的光辉，留有许多革命纪念旧址。其主要有一、梁山书院，是一九三〇年六月间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旧址；二、考棚，是一九三〇年六月间红四军司令部旧址；三、三官堂，是一九三〇年六月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四、南门坝，是一九三〇年六月间毛泽东、朱德同志检阅我县工农赤卫队旧址；五、清明山，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击退尾追之敌的地方；六、石径岭，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警卫连战士击溃反动民团的地方；七、象洞洋贝蔴蔴凹，是一九二九年象洞区农民武装暴动的地方；八、上峰、上岭村，是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间上峰乡农民三次暴动的地方；九、武北小澜村，是一九二九年武北地区小澜乡农民武装暴动的地方。

我县虽不是侨乡，但现据了解，武平人侨居外国的也有六十余户。他们分布于八个国家。有的侨裔在科学技术上很有所造就，如侨居加拿大的石以瑄先生已获得该国的博士学位。

武平山川钟秀，名山胜景不少。古传有武平八景：梁野仙山、南岩石洞、平桥翠柳、丹井温泉、龙河碧水、绵洋古刹、石径云梯、龙岩雨霁。此外，还有灵洞仙山、长安古洞等，都山峰奇秀，巍峨壮观，常使游人流连。

武平江山多娇，资源丰富，人民勤劳。但在那风雨如晦，黑夜漫漫的岁月里，我县却长期处于盗贼蜂起，股匪代出，地霸横行，鱼肉人民，贫困落后，民不聊生的状态。解放后，

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奋发图强，在农业、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科技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农业方面由于推广良种，科学种田，产量不断提高。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6601·82万斤，平均耕地面积亩产878斤。主要种植水稻，还有甘薯、大豆、烤烟、甘蔗、蔬菜、西瓜、柑桔、食茶等。一九八二年烤烟总产228·53万斤，大豆总产108·60万斤，花生总产14·68万斤，茶叶总产714担，水果总产7200担，农业总产值达7623·38万元。林业生产取得好成绩，一九八二年全县封山面积已达84万亩，造林17970亩，幼林抚育73591亩，林业总产值达902·55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的11·84%。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一九八二年生猪存栏数突破十万头，耕牛存栏18384头，鲜鱼产量4321担，畜牧业总产值达1072·73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的14·07%。副业生产主要有造土纸、烧石灰、烧砖瓦、采松脂等。一九八二年收购松脂达9300吨。副业总收入达1223·07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的16·04%。我县的猪胆肝，为独家特产，誉著八闽。

水电事业从无到有，现有水利工程四千多处（包括渠道），已建成可蓄水的水库25座，有效灌溉面积20多万亩，其中六甲、白莲塘、小坑水库为武平较大的水利工程，总库容量二千多万立方米。全县建有大小型水电站196个，机组计208台，总装机容量10616·8瓩。其中中山的龙潭水电站发电量最大。

解放前我县交通闭塞，基本上靠肩挑步行。解放后公路四通八达。一九八二年全县公路总里程为629·4公里，其中干线91公里。现在不仅有通往会昌、梅县、蕉岭、上杭、龙岩、长汀等跨省、县班车，而且县城与各公社之间均有班车往来。大部分生产大队也开筑有公路或简易公路。目前全县有153个大队可通车。

我县工业解放前是一穷二白的。现在拥有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建材、森林、食品、缝纫、文教用品等工业企业。一九八二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2789·62万元。特别是林产化工厂引用新技术，所生产的“帆船牌”松香运销海外，享有国际声誉，荣获一九八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委员会颁发的银质奖章。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现有完全中学7所，其中职业高中1所，普通初中12所，在校中学生达11901人。有小学205所，共有584个教学点，在校小学生达44413人。全县办幼儿班179班，入园幼儿4950人，各种类型农民业余夜校241班，学员6469人，职工文化补习班20班，学员1035人。有线广播空前发展，县有广播站，各公社有放大站。县、社都有文化馆（站）、医院（卫生院）和电影放映队。各大队有医疗站。县里还有专业剧团、电视差转台、革命史迹陈列馆、影剧院、皮肤病防治院和防疫站。

科技工作有很大进展，在工农业生产中学科学用科学成效日著。农业科技工作者在繁育良种、防虫治病、黄牛改良、北鹿南养、杂交猪一代利用、配合饲料、引种药材香菇等，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武平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同心同德地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针，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不断前进。

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三次入武平

县革命史迹陈列馆供稿

陈旭祥同志整理

(一)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谓“三省会剿”，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一部分留守井冈山，大部在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军长朱德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的率领下，按照在井冈山时期制定的“强敌跟踪采取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边境挺进。一九二九年二月四日从江西寻鄔罗福嶂进入我县黄沙村（现民主公社高书大队），当天又转入江西吴畚村宿营。

二月五日拂晓，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三十一团，冒着寒风雨雪，自吴畚村出发，经上增坑，进入我县东留龙溪，下午抵达东留圩。当天适逢圩日，红军一到，宣传队伍就在圩场附近张贴、书写、宣传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四言体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和各项政策主张。

二月六日，红四军从东留出发，经封侯、新联、大阳桥越过闽赣交界的黄沙，前往会昌的罗坑、河头、洞头等地。十日进抵瑞金以北大柏地，一鼓歼灭顽敌刘士毅匪部，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二)

大柏地一战后，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率领下，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于三月中旬从瑞金正式进入福建，经长汀四都镇直捣长汀城，消灭闽西的第一号军阀郭凤鸣，一举解放长汀县城，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依照三月份作出回师闽西的计划，应闽西武平一带人民的要求，在结束了江西寻鄔县城的社会调查后，率领红四军主力，再次进入武平县城。

六月一日，红四军主力从寻鄔剑溪跨越闽赣边境峻岭十二排，进入我县民主岭下。先头部队在溪头圩（现民主大队）神坛角击溃了妄图阻击我军的钟文才伪保商队。当天，红四军第四纵队发布了《敬告闽西工农贫苦群众书》，并宿营于溪头圩。

六月二日，红四军主力离开溪头圩，往武所（现中山）方向进军，抵武所城西沿时与上峰方向来的红六军会合，围歼盘踞在武所城的钟德隆团匪。敌人闻讯惊慌万状，急忙往中赤方向逃窜。我军占领武所城后，红四军主力随即向武平县城挺进，红六军留驻武所分兵活动。

红四军到达县城附近的丰口后，兵分三路前进。一路经中央坝由南门进城，一路经小头村、亭子岗由西门进城，一路经画眉坑、甘露亭由东门进城。盘踞在武平城内的地主民团钟绍奎匪部闻讯丧胆，连夜仓惶往岩前方向逃窜去了。我军未打一枪一砲就顺利解放了武平县城。

红军进城后，朱德同志随军部住在考棚，陈毅同志随政治部住在三官堂，毛泽东同志率前敌委员会驻梁山书院。

红军进驻武平县城后，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七、八天的活动，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武平人民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六月四日，红四军政治部于武平县城发布了《告武平劳苦大众书》，号召武平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赤卫队，消灭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分配土地，巩固红色政权，自己出来管理自己的天下。六月五日，红四军前委为更好地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重新翻印红四军政治部颁发的《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发至连队和地方。毛泽东同志在梁山书院亲自主持召开了各阶层群众座谈会，并派出红军干部分别在东岳庙、关帝庙、先贤祠、李家祠、林家祠、温家试馆、四方坪等地召开干部会、茶话会、妇女会、群众会、各界人士座谈会，继续作社会调查，为南阳会议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在少塘公祠召开附城地区泥、木、铁、五金、缝衣等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第一个木工工会。

二、建设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红军进城后，即帮助原县苏干部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恢复县苏维埃政府。县苏乘势发动群众，并发布《武平县苏维埃政府布告》，号召武平全县劳苦群众乘时奋起，勇敢地向反动派及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完成本县的土地革命。

紧接着，中共武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制定各项任务，使全县土地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高潮。

在红军的帮助下，区、乡红色政权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短时间内，城关就恢复和成立了城厢、西乡、城南、七坊、集贤等乡苏维埃政府。同时，红军还派出小分队往附城、万安等地，开展短距离的分兵活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红色区域。

红军临别前夕，在县城南门坝召开大会。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检阅我县工农赤卫队，鼓励武平人民为完成土地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红四军主力结束武平县城活动后，经武东袁畲、中堡等地转入上杭千家村。而后，毛泽东同志率领警卫连经才溪抵南阳，于六月中旬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大部奔袭回龙，击溃周志群匪部后，一鼓占领汀州城。

(三)

根据江口会议制订的红军新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城，在完成筹款、筹物、开辟闽南革命根据地等任务后，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初离开漳州，经龙岩、上杭白沙、才溪渡过汀江，分五路进入我县，转入江西。

毛泽东同志率东路军指挥部，从上杭回龙出发经羊牯、周家地进入我县小澜。当时小澜河正发洪水，苏区政府发动群众，配合红军利用木排、民船、门板等不误时机地渡过小澜河。尔后经湘里、湘坑、大禾、坪坑桥，抵帽布宿营，翌日转入江西。

红军路过大禾村时，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王良同志，因观察敌情，被土豪兰启观的武装匪徒冷枪击中，不幸牺牲。当即，我军开炮还击，匪徒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再次入武，给我县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巨大的鼓舞，游击队伍不断扩大，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各级区、乡红色政权进一步巩固，使我县苏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全县恢复和建立了武北、陈埔、武所、高梧、象洞、十方、湘湖、上中、昭信、六甲、大禾、东留等十二个区苏维埃政府和一百四十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各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很大的发展。

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大半地区分了田地，有的还进行了查田运动，发行公债，创办学校，开展献款、献物的支红运动，使武平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武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简介

县革命史迹陈列馆供稿

邱志良同志整理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上杭县各地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经过一夜激战，便攻下了闽西又一战略要地——敌人一再吹嘘固若金汤的“铁上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朱军长便派第三纵队开赴武平县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

伍中豪等同志率领第三纵队到武平的第一步工作计划，便在六甲、高梧、十方等地进行工作。当时司令部、政治部及直属队驻高梧区，七支队驻六甲区，九支队驻十方区。在各地农民协会配合下，第一步工作于十月六日结束，历时五天。在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先后召开了三个区和所属乡的群众大会、工农兵代表会等近三十次，建立了高梧区、十方区苏维埃政府和六甲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个乡苏维埃政府（未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的地方都有农会组织）。举办了党组织和基层干部训练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发展了党的组织。训练班学习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

1、支部工作、支部的意义、支部及干事会组长的责任；2、干事会工作；3、党团的作用；4、怎样发展及介绍同志；5、怎样观察同志和批评同志。

经过训练后三个区共发展了五十多个党员，建立了十方区委会和五个党支部。此外，还组织了五百人的区、乡赤卫队，以保卫红色政权。将土豪劣绅的四千担谷子和其它衣物分发给贫苦农民，筹得了四千一百元光洋的款子。所有田契皆收缴起来，准备分田。

十月七日，三纵队在象洞、上峰、武东等地的赤卫队配合下，向武平县城进军，钟绍奎匪帮闻风而逃，武平城回到了工农劳苦大众的怀抱（在此同时一纵队从上杭县境移驻我县上中区）。三纵队进城后司令部设在考棚（今城关中学），武平县委和一些干部也从象洞随军进入县城，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筹备召开第一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同时，三纵队各个支队和直属队组成很多支宣传队，分赴城厢、中山、万安等地乡村，用召开大、小群众会议、讲演、书写革命标语等形式，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纲，红军的性质、任务，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革命道理。十月中旬武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睦族祠召开，选举产生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一致选举练宝祯同志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委书记仍为陈道同志）。县苏维埃政府设在睦族祠内，下设：秘书处、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建设兼文化委员会等机构，领导全县工农劳苦群众投入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苏区，扩大红军等斗争。全县有五个乡分了田，建立了七个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武平正式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十月下旬，三纵队奉命出击东江而离开武平县城，县苏维埃政府迁到象洞，继续坚持斗争。

十载风云子夜中

陈 仲 平

这是我县革命前辈陈仲平同志早期革命斗争（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事迹的部份纪实。本文重点是叙述他在梅县一带活动的。但其中也涉及到两省边区——武平与粤东梅蕉两县革命活动的相互沟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到全国解放，这块地区的革命活动（从地下活动到武装斗争）都是联成一片的。这同当时中共武平县委的决策以及陈仲平同志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

编 辑 组

（一）

我是一九三〇年入党的。我的家乡象洞，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七日（农历八月初五日）暴动。那时，我参加了家乡（上光采乡）苏维埃政府，当过秘书。入党后，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一九三一年上半年起，我任武平县象洞区委宣传部长。这年秋天，武平县委白区工作部为了配合苏区的工作，决定从我们家乡向广东发展，开辟松源一带的工作。我的家乡在福建武平象洞岗背村，离梅县松源只有四十华里，每逢三、六、九都有人赴松源圩。所以，松源中学开办后，我们那里许多人都到这个学校读书。当时组织认为我去比较合适，叫我以学生身份，到松源中学开展党的工作。但我的学历很浅，只读过二年私塾，一年半小学，一共才四年的学历，就上初中，而且是第二个学期，还缺两年半的学历，怕人家不收。当时我的外甥谢瑞文先去上了学，我就请他把我的情况和意愿告诉当时的校长陈剑吾，问他收不收我这样的学生，可是，出乎意料，他十分同情，不仅同意吸收我上学，并且表示他个人愿为我出学费。这样，我便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农历九月初十）进了松源中学。象我这样，在学期中间插进来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松源中学尚属初办，规模不大，学生（包括高小）只有一百六十多人，校舍是清代考棚，破旧不堪，但我却象刘老老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到新鲜。

进了学校，碰到第一个大问题是经济问题。吃饭是自己家里担米来，比较好办，而每个月要缴十七毛钱菜金，却有点吃力。在进校之初，要一大笔钱买课本，更成了一个大难题。幸亏有一个慷慨的上一级的女同学王介樵，愿把她读过的书送给我，真是雪中送炭。

当时组织上要我到松源开展工作，但不可能从经济上支持我。因此，在我进校以前，同我哥哥研究了好长时间。当时我是店员，除了自身吃穿每月还有少量的钱补助家庭。如果我去上学，不仅不可能再支持家庭，而且自身的吃穿，都要家里供给。还要学费书籍文具用品等费用，估计每年至少要有六十块银元。这一笔钱相当于一千多斤稻谷价值。这时一个完全租种地主土地，劳动力又不强的我家，确实是难于负担。但是，由于我的哥哥也是党员，经过我和他再三研究，也就决定咬紧牙关，去了再说。还有许多亲友听到我想读书，都极力

鼓励，认为读得来的人，不读太可惜了。尤其是我的姐夫，家里比我好些，答应极力帮助。这样，才终于实现了组织的意图。

进了校门，这是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具备了在松源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但是，以后能不能打开局面还是一个未知数。把一个党员放出去开展工作，就好比一粒种子撒到地上，要它开花结果一样。有了下种的地，还要有许多条件，使种子能落地生根。而这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条件就要有起码的学业成绩。所以，我打算第一步就学好功课，争取各科及格，一二门主要学科成绩比较突出，才能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如果什么都不懂，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是不可能的，甚至还有可能站不住脚。因此，我竭尽全力学好功课，对历史、地理、生理卫生、争取能够及格就算了。对图、工、音、体只好马虎应付。但对重点学科，象语文、英语、算术，这三门主要科，我努力攻读。由于英语只在高小读过半年，仅能认识字母和很少的生字，只有依靠老师的辅导和同桌同学的帮助。我比较可以发挥优势的是语文，因为我在念私塾时，读过《三字经》、四书和《诗经》认识了很多字，虽然对字义的了解很差，书中讲些什么内容，我都不知道，但识字多，读起书来，还是一个便利条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高小时，我的作文分数就比较高。入松源中学以后，记得我第一次的作文得了七十九分。在当时作文分数最高的就是八十分，特别突出的有八十二分的，八十分以上的就贴堂，我的文章经常在班里贴堂，这样，引起语文老师温访春的重视，他经常当众表扬我，这样，班里的同学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由于我的语文成绩较突出，虽然其他功课平常，也就被同学们所重视。因此，第二年在学生会选举时，我被选上干事，担任出墙报的工作，经常写点东西在墙报上发表。这样，就为立足松源打下了基础。

这时，正是“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不久。梅县是著名的侨乡，人民的爱国观念较强，学校校长积极发动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每逢三、六、九松源的圩期，都派出学生到圩上演讲，贴标语。我也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当时，这还没有党的领导的运动，没有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那时，我除了学好功课，关心时事外，还经常阅读课外书籍。这不仅是个个人可以借此扩大知识面，克服教科书所得知识的局限性，而且是要大力提倡，造成风气，引导同学从课本里解放出来，面向社会，关心祖国、关心民族解放的方向问题。而当时在我们班有一个王立宪同学，就是一个最爱看课外书籍的人。我发现他读的书很多，知识面很广，而对现实是极不满的，我就主动和他接近，交朋友，很快就成了知心者。由于和他接近，很快就与和他同住满田燕治楼的堂兄弟立俊、立朝兄弟等结识了。不久，这个燕治楼就成为我们的集中点，长期人来人往，管吃管住，这是后话。

一九三二年，学校请来两个进步教师，一个叫王建良，体育教员，是一个本地人，大革命时期受过影响，具有进步思想的。一个叫李一村（即李菊生，现任香港新华分社的副社长）他是在马来亚搞革命活动被赶回来的。来校后，他被校长任命为训育主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的训育主任是应该由国民党员来担任的。但当时的松源中学是地方上自己办的，不是公立学校，加上校长有进步思想，于是，就把一个革命教师当了训育主任。从此，我在他们的帮助掩护下，开展工作当然就比较顺利。特别是王建良老师，经过一个不长时间接触以后，思想就见了面，我就开始和他研究在校学生中开展工作的课题。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由他发起组织半公开的读书会——“澎湃社”，当时参加“澎湃社”的只有七、八个人，除我、王建良之外，还有王玉清（女）、王春风、王宝钦、王菱祥、王立宪等。

“澎湃社”的主要活动是推动课外的读书运动，介绍和推荐进步书籍，开讨论会等，谈收获体会，当时王有好多藏书，如鲁迅、郭沫若和蒋光慈的文艺作品。还有《洪水》等文艺杂志。学校图书馆也有一些进步小说，如美国作家的《石炭王》，苏联著名小说《士敏土》、《静静的顿河》。最吸引初学青年的，而且影响特别快的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短裤党》等等。一读这几本书，就使同学们的思想很快得到转变。在此基础上，才引导他们阅读通俗的社会科学书籍。当时的社会科学作品还不多，比较多的是一些日文翻译过来的本子。本来在当时条件下，读书会是可以采取公开活动形式的，但是，我们把它弄得有点神秘化。开会讨论时，都找到没人发觉的地方去。例如有一次星期天到一个离学校很远的山上去。那次开会，王玉清（是我们教师的一个妹妹）的雨伞把丢在路上，被她哥哥拾到了，她哥哥就盘问她：你到哪里去干什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承认是去那里开学习讨论会的。由于听说王建良也参加的会，她哥哥也就没有怀疑和追究这件事情了。这说明自己在当时是如何地幼稚。

在一九三三年的“五一”节，我们用澎湃社的名义，出了一期地下墙报，墙报的名称就叫《澎湃》。从表面来看，就是奔腾澎湃的意思。但我们内心还包含着纪念澎湃的寓意。记得头一篇写的是《纪念五一节告劳动人民书》，还有一些短篇。当时很幼稚，故意把墙报涂得鲜红，人家一看非常注目，贴在学校出来右边小商店旁边的墙上。“五一”头一天晚上贴出去，第二天，周围的人哗然起来，很快轰动了整个松源，惊动了国民党的党政当局。当时听说驻军要来学校搜查，究竟是本地人搞的，还是外地来的共产党搞的？传说纷纷。有人说如果是外地来的人搞的，一定还会在别的地方出现。我们为了把视线转移，又重抄了一份，贴在松源老圩的一扇墙上。当时，松源中学教员由于勾心斗角，互相攻击，有的人说，国文教员温访春老师的儿子温卓峰（也是教员）是墙报的后台。温卓峰听了很恼火，在一次朝会上，痛骂这些人是造谣中伤，说这些人从来没看过我写的文章，凭什么说是我搞的？你们这些攻击，只能暴露你们的卑鄙，却无损我半根毫毛！这件事情闹得很厉害，为了防止驻军搜查，陈剑吾通知王建良，要他马上把原稿烧毁，不留痕迹。王立即叫我们把原稿送到他房里去藏起来，他估计即使驻军来也不敢到他房间搜查，因为王是大姓强房中的人，没有人敢动他。但后来得到通知说：驻军不来搜查，学校自己组织搜查就算了。校长实际上连形式也没有做，就报告说：没有搜查出问题。一场风波平静地过去了。

在读书会活动中，除了推动阅读课外书刊以外，我们很重视组织讨论。讨论是范围广泛的，文艺、理论，也有意识地引导到政治。有一次，曾经讨论到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这是共同的，成员中没有对国民党有好感的人。但是，有一个同学提出，国民党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并不是国民党这个党本身不好，而是那些党员不好。别的同学多数（包括我）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后者也不能拿出很多充分理由来说服对方。后来，建良建议写信去问玉清的叔父，在暨南大学读书的进步大学生王璋荃请他解答。后来得到王的回信，说等他暑假回来跟我们一块讨论。果然，暑假他回来了，建良就约我们几个人去见王璋荃。璋荃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上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进步性质。这样把我们的对方说服了，我们这方面的人也得到提高。这也同我们红军写的一条标语对上了号：“国民党是地主、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的总集团”。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成员的思想觉悟，而且通过这些成员团结了进步群众，为后来发展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除了读书会以外，还有更严密的群众组织，那就是赤色学生会。开头吸收入党的几个人都是事先参加了赤色学生会的。但是，由于这样的组织不可能发展成群众性的，实际上，可以参加赤色学生会的人，也就可以参加党了。所以，这个组织没有起到很大作用，等到最初吸收入会的人都加入党以后，也就自行解体了。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松源开始发展党员工作，先后发展了王建良、王宝钦、王春风（抗战初期自动脱党）王芟祥（现叫王华，在江门化工机械厂）为党员，又在校外吸收了两名党员，一个是老圩皮靴工人王文湘，后来跟王建良一起去苏区，以后下落不明；另一个是王兴书，农村青年（后来脱党）。这样，松源便建立起了第一个党支部。

在我来松源以前，武平县委负责同志告诉我：梅县党受破坏很厉害，现在是否还存在有组织的活动很难说。要我注意不要与别人发生横的关系。来到松源以后，我逐步了解到，梅县党在一九三〇年冬受到破坏，县委书记杨雪如同志等牺牲，在此以后，梅县党转入九龙嶂搞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后，就再没有听到活动的消息了。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是梅县党被打散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支部，但是，组织被打散后，散居各地的党员还是很多的，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到一九三三年冬，我在松源中学毕业了。在这两年半的时间中，我们同武平县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县委曾派人到松源巡视过我们的工作。县委白区工作部长练玉辉，工作人员罗发鸿都来过。此外就是寒暑假，我乘回家之便，都无例外地用口头或书面向县委汇报工作。也常常乘此机会带回苏区出的宣传品，回来散发。当时瑞金的出版物代表政府的报纸叫《红色中华》，代表军队的报纸叫《红星》，还有代表党的杂志《布尔什维克》。我们把这些出版物发给党员或进步的非党人士学习，有时还向社会上广为散发。有一次，我们把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圆形大印章的布告带到松源张贴和散发，内容是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号召全国全世界人民派代表参加。后面落款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我们散发传单都是在深夜进行的。我们从学校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新圩，过桥到满田、松岗坪、新南市到郑山下；另一路经老圩，从桐子坪、老圩、也过河到郑山下，两路在学校对岸汇合后，一同涉水回校。有时我们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搞得民穷财尽的传单贴在学校门口，引得师生、过路人都来看。有一次，我同我们那位七十多岁的国文老师温访春先生站在一起看传单，传单上针对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穷凶极恶的压迫剥削，以致民穷财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发，其中有一段提到，国民党使水灾、旱灾遍及全中国。温看后发表意见说：有些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不同意水、旱灾遍及全中国归咎于国民党。他没有深想，国民党只知对人民进行剥削，而不知搞建设，搞水利，而且被弄得民穷财尽之后，老百姓根本无力自行兴建水利，防旱防涝，水灾、旱灾，哪有不纷至沓来的道理？他是以朴素而直觉地来理解问题的。我在旁边听了很好笑，但我不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去对他解释。不过，这种议论，对我们宣传群众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是很幼稚的。在农村的条件下，社会情况是极其简单的。如此大张旗鼓去出地下墙报，散发传单，实际上就是告诉敌人，在松源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例如：把墙报贴在学校门口，如果敌人认真追查，笔迹很快就可以查出来的。实际上是受一种左倾情绪影响。那时，我经常从象洞带文件到松源，随便装在书包里，到校后就放在盛米的铁箱里，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我同后来的党员张春汉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次，我从家里带了大

批文件回来，放进米箱里，春汉打开铁箱一看，吓了一跳，我不得不提早向他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面目，他要是是个坏人的话，我不早就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了？

一九三三年冬中学毕业以后，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学习结束了，但工作还得继续下去。这就是说，我不能和别的同学一样，一毕业，把铺盖一卷就滚回家去，问题是要如何在松源继续待下来的问题。待下来最好就是能找到一个小学教员当。但是，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当时，在松源这样的农村环境，也是人浮于事，大学生，中学生长期就在家泡着的有的是。而我这时有两个得力的人可以帮助我找职业，一个是校长陈剑吾，另一个是国文教员温访春。他们都早说过，毕业以后就在松源找事做。后来就是通过陈剑吾的关系，在凹下村明智小学找到一个教书的岗位。凹下，比较靠松源的边沿上了，离新圩和中学约有十华里。但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又有了一个开辟工作的新天地。就在这时，我认识了陈振厚（他是凹下村人）、陈秉铨、陈连亨、陈宏义等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这里离松源最南边的一个大村子宝坑很近，于是我们又把工作往这边开展，通过振厚认识了黄清宇。同时，梅县第十四区的区公所就设在紧靠凹下的桥下街，区长是湾下人陈子华，彼此互称叔侄，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很好的保护伞。这时，我们有了两个活动中心，一个是新圩周围以中学和王立俊、立宪、立朝弟兄家的燕治楼为活动基地；另一个就是桥下周围以我所在学校为活动基地。这时，国民党区公所，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集中场所。我是区长的上宾，区公所里的陈连亨，还有一个同情我们的张指导员。所以，我们的人到区公所是出入自由的，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这时，在松中，党员中我和王春风都已毕业，王建良已去苏区（后面详细讲）。但学校的工作并未削弱。除还未毕业的党员外，受党影响的一批进步学生起来了。他们中有王维、王立俊、张春汉等人。在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的参与和掩护下，开展起比较大规模的进步活动。如组织剧团、演出话剧等。这一年校长已换成温卓峰当了。温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这时对一些进步活动也还是支持的。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对他公开了我的政治面目，要他利用他的地位，掩护和帮助我们开展工作。他同意支持，但要我们注意方式，别使他下不了台。我们也答应照顾他的地位。所以，学校的上层掩护，也没有因陈剑吾的去职（还当教员）而受影响。

在我毕业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由我们推动温卓峰发起组织起校友会。校友会的成员是非常广泛的。凡是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包括在校的和已经离校的历届毕业生。当时，校友会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学行，提高六甲（注）文化，促进母校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在上半年成立。成立时，开了相当大规模的大会。以在校学生为基础，并广泛动员了在松源的小学教员和其他职业的校友参加，共数百人，相当热闹。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了干事会和选举了会长。我被选为第一任的会长。大会通过聘请当时国民党的副军长黄延楨为名誉会长。

我们所以要推动成立这一组织，其目的是在于通过它更好地配合党开展松源的工作。

我们紧紧抓住会章所规定的宗旨进行工作。根据实际结果来看，这个组织至少起到了如下作用：

（1）根据“促进母校发展”一条，我们校友会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过问学校的事情。例如：经过争取，得到学校经济委员会的同意，在选举校长时，校友会有一票之权（经济委员会是松中最高的权力机关，有选举校长和审核经济的权利）。

（2）根据“提高六甲文化”一条，校友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过问整个六甲的各个小

学。我们曾经用校友会的名义发动所有小学办妇女夜校，取得了不小成绩。

现在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李碧山（即李班）同志的来历以及他和王建良同志去红色首都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冬天，王建良同志到汕头去医牙。在那里有一个太原齿科医院，是台湾籍人开的。建良在那里医牙时，认识了在那个医院当杂工的李碧山（当时叫李平），在此以前，他是在越南搞革命被反动当局赶出来的。王在住院期间和李接触多了，彼此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面目，建良对李碧山说：可以找到门路到红色首都瑞金去。李碧山听了极为高兴。说好后，在一九三三年冬，王建良出院时，就把李碧山带到松源，在建良家里住了下来。那时还未放假，王叫我会见了他们，他们要求二人一同去苏区。于是，在学期结束后，我回到家乡将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得到县委同意后，于一九三四年春节后，大概是农历正月初三还是初四我回到松源从王建良家把他们带出来。为了避免外人耳目，是在天还没亮前动身的。同行的除了李平、建良外，还有一个松源老圩的做靴工人王文湘（也是党员）。在路上碰见熟人就说去上杭，因为建良有个叔叔在上杭做生意。当天到了我的家乡（象洞），住在洋背一个党员同学家里。

当时游击队还没有来，在那里等了好几天，直至初八晚上游击队才来了。可是，游击队接受任务，要在这个村子里抓土豪筹款。那天，这个村子里正好迎神打醮，祠堂门口有赌博的，有玩各种游戏的，很是热闹。游击队侦察到有地主练通茂的儿子在赌场跌骰子，就把他抓来了。游击队完成任务后，我就把李平等三人交给游击队带往苏区。

李平生长在越南大城市，有生以来是第一次走长路。特别是在晚上走山路更为艰难。后来我们游击队的同志说：有一晚上他实在走不动了，由王建良和其他同志背着他到苏区。他们三人大约在正月底就到了瑞金，他们都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

去到瑞金后，王建良同志先后给我来过多次信。每次的来信都充满着革命激情，兴高采烈地给我描绘红都瑞金的美好情景，报告他们的生活和观感。他谈到他们的学习生活时说，瑞金的早春，天气还很冷，党校大部份学生围着被子在床上听课。但大家的情绪还是很高的，一个个聚精会神，孜孜不倦。他还谈到，由于受国民党的封锁，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在精神上是很乐观的，对革命充满胜利的信心。他以很大的兴趣谈到瑞金红都，人才济济，其中提到成仿吾时，对他的形象、风貌，都做了很细的描写。其中有一封信提到，有一次，中央曾决定派他回梅工作，已动身，但到汀州后，中央又有新的决定，把他叫了回去。

王芟祥同志也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过苏区，当时武平县委白区工作部长练玉辉来松源巡视过工作，曾去松口采购西药，来回都住在我校，王芟祥事先与练约好了，等练由松口回来经过松源他们约定的一个地点时，就跟着一同去了。

等到十月份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我就不知道李、王他们的下落了。直至一九三六年暑假期间，我才发现李在汕头。他怎样去汕头的呢？他和王建良在瑞金党校学习约有半年的时间，后来，他们分开了。他也不知王建良和王文湘的下落。红军长征后，李曾被国民党逮捕。当时，被捕的人很多，李承认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广东人。国民党还假仁假义地发了两块钱路费，被释放了。但李回到梅县时已身无片文，只好在街头要饭吃，不料，又被国民

注：“甲”是旧时划分地区的单位。松源本身有四甲，包括蕉岭的南、北际有两甲，共六甲。松源中学是这六甲共同办的。记得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改名为“蕉岭六甲联立中学”，简称联中。

党警察逮捕。他说他是汕头人，出外找工作，流落到此，因钱用光了，不得不要饭吃。敌人因无什么证据，就把李押回汕头后，由熟人把他保出来了。他出狱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太原齿科医院去当工人。这样，他有了吃饭的地方，不久又重新开始了革命活动。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后，直接领导我的武平县委也被打散了。后来听说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也瓦解了。不少人投降了，其中有一个投降的游击队员供了我，但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我是党员，只知道我是在外面教书的。而教书的，在我村里只有我一个人，因此，国民党区公所在春节前逮捕了我，但由于叛徒知道我的情况太少，无法定我的罪，当天就把我释放了。从这时起，我和上级联系中断了，松源支部处于独立活动状态。但我们的工作没有中断，支部照样开会，群众工作照样进行。但在那时，我就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因为按规定，发展党员要上一级党组织批准。本来，在特殊情况下，应该灵活运用这一规定，可是，我死守这一规定，以致好多成熟了的对象，不能及时吸收到党内来，使党组织不能扩大，这是党的损失。这种情况继续了两年多。所以，当时支部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组织群众，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读书会。我们还同上海生活书店一个化名沈洛池的人取得通信联系。自从我们和他通信以后，经常收到他寄来的大批文件、书报、刊物。如：上海出版的小型报纸《路灯》、《时事周刊》和《新文字月刊》，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海参威出版的《拥护新文字》，以及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就收到了道林纸精印的《八一宣言》。通过这些文件和书刊，使我们这些失掉上级联系的人，对党的方针政策了如指掌，没有迷失方向。同时沈还要我们介绍朋友跟他通信。我给他介绍了松口、兴宁、和平等地的十几个人。无疑，他们也又会转介绍许多他们的朋友。可见，沈洛池这个通讯网是相当大的。我一直到现在对这位沈洛池还是非常怀念的。但还一直没有弄清他是个什么人。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邹韬奋同志身边工作的，因为在两广事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打起反蒋抗日的旗帜时，韬奋曾到香港办《生活日报》，这时，沈也到了香港，在香港跟我们通信。我们的一位同志王芟样，当时在香港读书，曾去会见过沈洛池。以后，两广事变失败，《生活日报》停办后，沈又回到上海去了。在上海，还给我们来过信。后来，在《永生》杂志上曾看到一条不幸的消息，报导一个叫王永德的逝世了。从报导的事迹看，王永德很象沈洛池。其中说王曾经跟好几百人通信。从此以后，沈再没有给我们写信了，而且我们写信去也得不到回复。所以，我断定沈洛池就是王永德。但这也还不能完全肯定。王芟样告诉我说，《永生》上登的王永德的照片不象他在香港看见的沈洛池。

在我脑子里断定沈洛池是一个共产党员。几十年来，在我脑海里老有一个孜孜不倦、埋头苦干，只知有人，不知有己的形象。我但愿沈洛池不是王永德，他现在还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的某个地方。果然如此，我祝福他健康长寿！如果是王永德，那我就要向他说一声：永德同志，你安息吧！

回想起来，当年我自己也用过沈洛池这个经验，用通信方式进行革命活动。我体会到这种方式，所起的作用相当大。往往只有一面之交的人，经过通信，彼此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情加深了，就可以思想见面，共同探讨革命真理，最后，引导对方走向革命道路。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有个同学叫王传谨，他是个侨生，在同班念书时，思想比较落后，对我有些嫉妒，他曾对我写的一些文章当面发表议论说：有共产党的味道。后来，我主动跟他交朋友，没有留下恶感。毕业后，他考进国民党在广州的一个军官学校。我知道他的地址后，主动给他写信。经过一个时期的通信后，彼此的感情一天天好起来。等他第一次暑假回